



中國文學理論史

(一)

蔡钟翔

黄保真

成复旺

著



蔡鍾翔 黃保真 成復旺 著

中國文學理論史  
(一)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学理论史》共五册，此为第一册。包括先秦至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史。书中以儒、道两家文学思想为主线，阐明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对老、庄及玄学家的文学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作了新的评价；对《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著作及教化说、缘情说、滋味说、自然之道、言意之辨等重要观点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 中国文学理论史（一）

Zhongguo Wenxue Lilun Shi

蔡钟翔 黄保真 成复旺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81 000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00-01355-2/I·186

定价：（精）9.40元

## 出版说明

本书分五册出版。第一册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第二册为隋唐五代宋元部分，第三册为明代部分，第四册为清代部分，第五册为近代部分。

本书共分七编。全书有绪言，每编有概述。绪言及概述可以当作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史的论文阅读，亦为本书之大纲。

本书经作者定名为《中国文学理论史》。过去同类书多名为文学批评史。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与西方传来的文学批评一语，并非同义。解放后，郭绍虞先生即率先将他的书题名《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本书作者为了进一步“正名”，取了现在的书名，并在绪言中作了说明。

北京出版社

1984年10月

本册(第一、二编)《诗品》一章由黄保真撰写，其余部分由蔡钟翔撰写，全册由蔡钟翔修改定稿。

---

## 绪 言

中国文学理论源远流长，但人们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方才开始。二十年代，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早著先鞭，写成了《支那诗论史》，由孙俚工先生逐译，改题《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卷于一九二八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一九二七年陈钟凡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起步。草莱初辟，难免疏略，但大体框架已经具备，体例和结构较诸铃木氏的著作更为完善，陈著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一九三四年，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刊行，取材宏富，立论精审，固已大大超过陈著，而且深入探究理论的成因、发展的轨迹、历史的分期，洋洋大观，引起学术界的瞩目。虽然不是第一部，而朱自清先生仍赞誉为“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sup>①</sup> 只是因抗战烽火继起，延搁十三年之久下册才得以付梓。几乎与郭著同时，又有方孝岳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出版。此书虽未题名为“史”，而“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sup>②</sup> 实有史的性质。虽非宏篇巨帙，但编排独具特色，择取文学批评史上之重要事件、观点、人物、著作，分章论述，各冠以醒目之标题，不求全面，而重点突出，亦时有卓见闪耀其间。朱东润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初稿写成甚早，但出书则迟至一九四四年。此书以讲义

---

① 书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清华学报》九卷四期。

② 见该书导言。

为基础，表现了教材的特点：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一律以人立目，不标时代流派，体例统一，保持作家思想的完整，自有其长处。对问题的论列，不乏独到的见地。罗根泽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周秦汉魏南北朝部分早在一九三四年即已面世，一九四三年重印，又扩充至隋唐五代，一九五七年续出两宋部分已在他逝世之后。惜乎罗先生早逝，其书未成全璧，诚为学林憾事。罗著在体例上蹊径独辟，兼融编年、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于一书，谓之“综合体”，内容颇有创获，而其搜罗材料之广博实已超擢群书。这五部著作，以其各自的建树交相辉映，代表了解放前二十余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与中国文学史的撰著相比，在数量上虽然弗如，但质量上并不逊色。而且大都成书于战乱动荡的年代，尤属难能可贵。其共同的缺陷是，小说戏曲批评都受到了冷落，又由于时代的局限，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建国后的头十七年中，学术研究日趋繁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队伍也更加扩大。新老学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于研究工作，使学术论著面貌一新。有关古代文论的专题讨论，如刘勰的世界观问题、“风骨”问题等，也曾一时喧腾文坛，掀起了“《文心雕龙》热”。然而撰写通史的收获却并不丰稔，计得郭绍虞先生的旧著改写本及新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以及前述之罗根泽先生著作的两宋部分。这不能不说是这门学科发展的不足。而且由于“左”的思潮的冲击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流行，一些研究者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例如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牵强附会西方的概念，用某种公式剪裁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这样既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又丢弃了求真尚实的治史的优良传统。这一段时期的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遗产横遭浩劫，学术研究陷于停顿，十年荒芜，殊堪痛惜。但是巨大的历史灾难总要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复兴的势头来得很猛，近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论文和专著的生产一年多过一年，通史的著作也络绎而出。如敏泽先生独立完成的七十万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强批判分析，注意作纵向和横向的联系比较。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等继续编写原由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已出的中册来看，除保持了上册所有的持论公允、体例严整、行文雅驯等优点外，思想较前解放，故理论分析的深度也有显著提高，又因编写者有文学史的深厚功底，评判理论观点多能密切联系文学创作的实际。黄海章先生的《简史》修订本增补了内容充实的近代部分。周勋初先生的《小史》则以精炼的篇幅，为知识普及作出了贡献。目前许多研究者正在辛勤笔耕，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批评的通史以至断代史、专题史、分体史陆续诞生；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在研究水平上将有新的突破。

要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关键还是在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是关系到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根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求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sup>①</sup>合乎实际地阐明古代文论的历史内容，描述古代文论的历史进程，应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这里十分重要的是必须遵循历史性的原则。黑格尔曾经指摘哲学史研究中的一种偏向：“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

<sup>①</sup>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



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sup>①</sup>列宁是非常同意他的意见的，所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sup>②</sup>那种“改铸古人”的做法，有人称之为“现代化”，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例如对《文心雕龙》的阐释和评价，有的研究者把“要约而写真”（《情采》）解释为既要按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指“写真”），又要典型化（指“要约”）；把“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解释为要求现实主义（指“真”“实”）和浪漫主义（指“奇”“华”）的结合，如此等等，并进而作出结论：刘勰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现实主义理论。这实在是把古人事实上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思想硬挂到他们名下，按照这种说法，西方在十九世纪方始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却在五、六世纪就早已成熟了，那末从梁启超等人开始引进和宣传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不过是数典忘祖的倒退罢了。显然，这样就会把历史过程的原貌搅乱。需要说明，我们并不主张“以古释古”，而且认为应该用现代的语汇（包括现代文学理论的术语、范畴）来诠释古人的理论概念，但是必须避免牵强的比附。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sup>③</sup>正因为古人和今人的理论思维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巨大的差别，“以古释古”会使我们停留于古人的水平，而随意的“现代化”又势必“拔高”古人。由于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因长期闭关锁国以及交通的限制，处于同西方隔绝的状态，理论思维的内容和形式也与西方大不相同，所以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作中西异同的对照比较是必要的，参照西方的理论

① 《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6页、第112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

③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来阐明中国古代理论的涵义也是容许的，但生拉硬扯地以洋套中就会象给古人穿西服那样不伦不类，甚至完全歪曲了古人的本意。

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也就要反对从任何现成的概念、定义、公式、原则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说明：“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sup>①</sup>“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的。”<sup>②</sup>“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sup>③</sup>然而在从事实际研究时，我们往往将这些教导置之脑后，不是从事实中抽象出原则，而是让事实去适应原则，如套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来概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一例，这种研究方法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为了坚持严格的历史性，还必须注重材料的鉴别和选择。例如，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历来被人当作假托的对象。如果我们把《易传》、《礼记》、《孔子家语》、《说苑》等书中的“子曰”，统统不加审辨地都当作孔子的“遗教”，这样来研究孔子的文学思想，就会弄得面目全非。孔门记录孔子的言论是非常简要的，往往用三言两语表述一种观点而不作论证，后世儒者极便于借孔子的命题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清哪些思想属于孔子，哪些思想属于后人。如果认为王夫之的“兴观群怨”说阐明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实质，那就无异于使孔子跨越了几个历史时代。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③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毫无疑问是应该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的，我们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但应该明确，“古为今用”与坚持历史性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既然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和前天的中国发展来的，那末了解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必定会有助于解决当前的文学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为今用”的基点。至于有些人在历史研究中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任意改塑古人、伪造历史（即使其目的是革命的、进步的），那决不是我们所要求的“古为今用”，因为这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取消了历史科学，因而也就在根本上取消了“古为今用”。

“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是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但不满足于这一步，还需要把历史的研究方式和逻辑的研究方式统一起来，致力于揭示历史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规律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不是一大堆偶然现象的胡乱堆积，而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sup>①</sup>这个揭示规律性的任务，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前辈郭绍虞先生在他的著作的《自序》中说：“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愿粗鲁地观衢路。”并且将自己的论文集题名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这表明他的治学态度的谨严谦逊，但决不意味着对探索规律性的忽视，恰恰相反，他早在三十年代就非常重视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规律的研究。今天我们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装，当能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

近来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中涉及到所谓“宏观研究”问题。规律性的探讨大概属于宏观研究之列。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目前宏观研究还缺乏条件，只有在更加充分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

<sup>①</sup>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能进行宏观研究。当然，我们不赞成不顾史料而凭主观臆测去“制造”规律。详细地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结论，才是正确的研究途径，也确实需要大量的专题研究为更高程度的综合建立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赞成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分割为两截，因为微观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很难说达到什么阶段才算具备了宏观研究的成熟条件，这样就会把规律性的研究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实际上等于勾消了这项任务。而且单纯地把微观研究看作宏观研究的前提，也是片面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①</sup>“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sup>②</sup>这样的要求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样是适用的。即使是研究一位作家、一部著作、一种观点、一个概念，如果不放到广泛的历史联系中去考察，是难以获得准确、深刻的认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研究是不是也成了微观研究的前提呢？因此，我们认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规律性的研究应当排上当前的工作日程。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探索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规律的指南，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排除偶然性对视线的干扰，找到隐藏在深处的客观必然性。但我们要防止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化为套语来代替复杂细致的研究工作。过去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曾经取得了成果，也出现过偏差。今天我们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有可能对如下一些理论问题获得较全面的认识。

---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 一、关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人类社会史，也就是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中对此作了简要而精确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马克思在社会存在中又突出强调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文学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归根到底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那末中国文学理论的整个历史过程也只有联系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中国历史上文学思想的几次重大转折，如明代文学解放思潮的兴起，近代文学观念的革新，莫不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有关。如果我们研究的时期较长、范围较大，的确能发现文学理论发展的轴线和经济发展的轴线之间的平行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具体的理论观点，那末仅仅用经济原来解释就显得过于笼统，甚至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历史现象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恩格斯曾为此特作申明，以纠正当时一些青年对唯物史观的曲解。他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话很值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得我们深思：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是决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对于在上层建筑中居于远离经济基础的层次的文学理论来说，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而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等的影响倒是直接的，经济基础和文学理论的联系往往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说明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进程时，应该注意到经济关系这个终极原因，同时也应该揭示“中间环节”的影响，这样，各种理论观点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充分的具体的说明。影响文学理论的因素是众多的，除了政治、哲学、道德、宗教而外，还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如画论、书论、乐论等），当然文学理论还必然会受到文学创作实践和自身传统思想资料的制约。探究这些因素的作用，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 二、关于阶级分析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sup>①</sup>列宁指出，这个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使我们能在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规律性的指导性线索。<sup>②</sup>历史上文学思想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我们研究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当然要借助于阶级分析的方法。

但是，运用阶级分析法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又需要估计到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然而，农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从事精神生产的条件，很难产生自己的文学理论家。历史上文学思想的斗争，大都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或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有一些纯属艺术流派之争，谈不上是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但因为历代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他们提出的要求在客观上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因此，地主阶级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一种“折光”。这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就不能只限于分析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对抗，而要用更多的力量去深入分析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

确定文学理论家的阶级或阶层的归属，不能只着眼于家庭出身、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主要的根据应是他的思想倾向，即他的观点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这一点马克思早已讲得很

---

①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② 见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清楚：

……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决定，就是小资产者由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实践中所得出的那些任务和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sup>①</sup>

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据说是手工业者出身，但一生从事政治活动，属于“士”的阶层，他在当时社会地位很高，可以介绍弟子到各国去做官，墨家学派号称“显学”。确认他为小生产者的政治代表，主要是因为他的学说反映了“农与工肆之人”的愿望和要求。这种情况增加了阶级分析的困难。先秦诸子中的孔子、老子、庄子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在学术界一直是有争议的。为了考证刘勰的家庭出身，研究者花费了不少力气，这对探讨刘勰的思想的阶级根源是有益的。但是确定刘勰的阶级（或阶层）归属，还得取决于他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因为庶族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可能成为世家大族的代言人。

要对某种文学理论作出评价，仅仅依据文论家的阶级（或阶层）归属是不够的。一般地说，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包含较多的民主性精华，然而又不能笼统地否定剥削阶级的一切文学观点而肯定劳动人民的一切文学观点，因为封建社会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小生产者，小生产者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他们具有二重

---

<sup>①</sup>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此处用《列宁全集》中引文的译文。



性，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因而反映小生产者利益的文学观就未必是进步的。例如，墨子的《非乐》表达了春秋末期刚从宗法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愿望和要求，荀子的《乐论》则与之针锋相对，表现了鲜明的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可是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荀子《乐论》的历史价值却大大超过了墨子《非乐》。从总体上讲，代表新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当然要比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进步，然而又不能笼统地认为新剥削阶级的文学观在一切方面都胜过旧剥削阶级的文学观，因为新剥削阶级的观点固然是激进的，但可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而旧剥削阶级的观点虽然是保守的，却可能凝聚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例如，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韩非的文学观，同作为奴隶主阶级代表的孔子的文学观相比，在许多问题上都大大倒退了。从发展趋势看，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是由生气勃勃的先进者逐步转化为腐朽、反动，然而又不能笼统地判定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观就优于处在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观，因为剥削阶级即使在上升时期，其文学观中也带有不少消极的成分，而在它没落时期又可能出现一些集大成者，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例如，在封建盛世的汉代，董仲舒的文学理论值得肯定的东西是很少的，在封建末世的清代，王夫之、叶燮的文学理论倒应该给予较高的估价。此外，还要看到，同一阶级、同一阶层或同一政治集团中，在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会形成分歧很大甚至互相对立的文学观，相反地，不同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的不同文学观之间又可能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因此决不能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种文学观，而对立阶级的文学观又必定是水火不相容的。由此可见，用简单的划成分的方法，只从各阶级（或阶层）的一般状况出发来推论，是无法正确评定文学观点的是非得失的。

对于文学理论家来说，还有一个政治观和文学观的矛盾问